

我的回忆

陈碧兰

第八章 在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学习与中国旅莫支部的教育

我们学习的范围，并不限于学校的课程方面，如由负责同志们报告或从中国寄去的向导周刊、新青年杂志及前锋季刊等，都是我们研究和讨论的题材；同时指定一部书分章一同阅读逐章讨论等等。据同志们说：当彭述之在那里时常作报告向同志们讲解各种问题，从历史唯物论、经济学乃至中国历史等等，对他们作了很多的贡献。自一九二四年七月彭述之回国后，继任的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他也是湖南人，是同彭述之同时去莫斯科的（一九二一年），他有魄力，且有相当的鼓动才能。从他的中文程度，和一般科学知识看来，他在国内所受的教育并不高，而阅读的书籍也不甚多，因而缺乏一般的知识。但由于他在俄国的时间甚长，俄文很好，同时又参加了俄国党，直接受到列宁传统的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因而具有一般的理论水准和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自他继任书记后，也时常作报告。虽然他的题材仅限于从俄文中所能获得的材料加以处理和发挥，而不能运用历史或其它知识加以比拟和发挥，使其现实化而易于了解，不致感到单调和偏向，但这些报告对于同志已经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了。

我们除了听取这种报告外，常常全体集会讨论从中国寄去的向导周刊、新青年杂志以及前锋季刊上的重要理论性的文章。至于同读一部书分章讨论，那是在每一个星期小组会议上进行的（当时读的是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的ABC》）。当我们集体讨论彭述之回国后所作的第一篇长文，题为《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时，我们一致认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有系统的分析和叙述从鸦片战争（1900）开始，英帝国主义以大炮轰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后，英帝国主义从此便在中国获得商业经济上的特权，因而，法、美、德、俄、意、日各帝国主义也都争先恐后地向中国这个大市场时发，经过一系列的灾祸，如“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直到义和团起事之前夕，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已经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已逐步沦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了。

彭述之在阐述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侵略之后，他列举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图表、数字和统计，以资证据；同时，他对义和团的成分、经济背景及其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原因和意义，作了客观而科学的分析。由此，他作出了一个结论：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农民群众受了帝国主义的过分压迫而起的一种反帝国主义之民族革命运动。”

这个结论，在我们讨论了他的整个内容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实际上，它不但打破了一般人的所谓“野蛮排外”或“拳匪之乱”的传统观念，使那些当代的史家和教授们，如胡适等大为吃惊，他们高声地喊出了同样的声音：“这种说法是推翻了中国的历史传统，这是中国历史的翻案”；同时，即在共产党里也确定了一个正确的观念。在此之前，党内从来没有确定上述彭述之对义和团运动所作出的这个结论的观点。

随后，当我们讨论彭述之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国民革命专号）上写的一篇题为“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这篇文章时，大家都认为：他的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利益加以详细分析和阐述，以及它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可能起的作用，也客观地给以分析和估计。他首先从中国的资产阶级说起，都有详细的分析。从分析中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因而他说：

“要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和领导者，宁非梦想”。他并列举资产阶级在历次的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中总是站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方面。

彭述之在对资产阶级作过分析和估计后，跟着便对工人、农民、乃至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小商人，以及游民无产阶级等，都按其各自的经济背景和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加以分析和估计，他所得出的答案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因而仇视帝国主义和军阀，革命的要求特别强烈，并列举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假如工人在反帝国和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起着何种作用，他们是会跟着工人走的。因此，彭述之在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利益和在国民革命中起着何种作用，并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性后，他得出一个总的结论：

“我们分析以上各种阶级，除开游民无产阶级外，差不多是与工人阶级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暗示与指导。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识之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

上面的这个结论，已经回答了“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他的文章的题目。但由于他的思想不是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革命为满足，因而他又补充了以下的意见：

“可是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绝不限于国民革命，绝不限于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它自有更伟大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它一方面须极力领导国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

当我们认真而详细地讨论了这篇长文之后，我们发现在这篇文章中，他虽然没有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却是针对着陈的那篇题为“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前锋季刊第2号）一文而写的。他从中国各阶级（从资产阶级一直到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阶级利益、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它们的反动性和革命性的分析中，客观上已经驳斥了陈独秀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工人阶级的数量少，知识缺乏，不能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同时，在同一期新青年杂志上，我们也看到了陈独秀的一篇题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的教训”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据“戊戌变法”，“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中国历次的国民运动的事实教训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二十余年以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

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必须它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从陈独秀的这篇文章看来，他已放弃了以前的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立场，而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正是莫斯科东大的中国同志所支持的。在此之前，同志们认为陈独秀和那篇“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以为然的。但自此以后，关于这个问题，即谁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无论在向导和新青年杂志及前锋季刊上，都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除了一般的学科阅读研究和讨论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外，我们的小组会议上还讨论革命党——共产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关于一般的组织纲领，比较容易了解。但我当时觉得在讨论到“民主集中制”时，就很难了解而感到有些抽象，虽然讨论了好几次。因在那里所过的生活，还不是正式的党的生活，不能从现实的当的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去体验“民主集中制”的真实内容和他对于一个革命党的重要性。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回国后，参加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才获得了解。

我当时深深地感觉到：旅莫支部领导层同志，对党员和团员的教育从各方加紧进行，确实加速提高了同志们的理论水准；同时，实行严格的批评制度，而这种批评，不但在各小组会里进行，于必要时还在全体大会上进行。但不管开全体会议进行批评与否，中国旅莫支部的执行委员会每月必须集合各小组的相互批评，制成一幅批判图案，每一成员均站一块地位。写成之后，就把它以图钉钉在人人必须经过的宿舍宽大的走廊的墙壁上，等于一月一次的判决词。同志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去阅读自己的或别人的判决词。那些曾经受过批评的同志，当然是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但那些曾经获得好评的分子，他们是怀着一颗自信和愉快的心去欣赏自己荣誉的称许和鼓励的词句的。我当时有点感觉这种公开批判的制度，有利亦有弊：那些获好评者固然可以得到鼓励，而更发挥其所长；但那些获坏评者，则会伤害其自尊心，而日渐失去信心，可能使其自暴自弃。

这种批评制度，本来是为教育、鼓励和纠正同志的错误和缺点的，但假如实行起来不适当或机械，那就会实得其反，它将变成为摧毁同志的自尊心，而使其自暴自弃或消沉萎靡。尤其是把批评文公布出来贴在墙上的办法更不妥当。我以为：假如发现同志之中有错误或缺点，小组会上批评还嫌不够的话，执委可派人与其私自谈话，批评某些错误或缺点，而不必让他人知道。这样，既可以达到批评的目标；同时还很能够保持每一个人应有的自尊心，改正其错误或缺点可能更有效力。据同志们说，这种批评制度，以前是没有的。我当时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点不妥当，但不知其所以然。事后想来，这是从苏联共党内斯大林对付托派的作风中反映而来的。尤其到了1925年初，这种批评制度更是变本加厉，这自然也是斯大林官僚制逐渐发展的结果。但当时的中国旅莫支部不但没有一个托派，而且也不知道托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领导层中也没有一人有官僚的表现，只是他们无条件地信仰苏联，联共叫他们怎样做，他们就忠实的执行，不过执行的方式，按照他们各自的性格作风不同表现出来的轻重不同吧了。

此外，使我深深感觉到的是当时党和团对同志课外的教育方法有些浪费精力和机械。例如把许多的时间消耗于个别的谈话中。执委决定每一个同志每星期必须有一张报告表给其所属小组书记，上面必须填写同几个同志谈话的名字和内容。因此，弄得大家很不自然地硬去找人谈话，来报销这一个星期的工作。为了报销工作而谈话，那么这种谈话必然产生敷衍和虚伪的弊病。至于谈话的内容，第一次多半是相互报告自己的历史，以便彼此容易了解，我觉得这倒有相当的意义和必要。因为要想深刻地了解一个同志，必须首先知道他或她的出身、环境以及其重要的思想发展和历史过程，但时间愈久，谈话的题材便感缺乏，只好硬找一些题材来谈，这就有点浪费时间和精力了。而且我们空余的时间很少，因此大家都是利用从宿舍到学校，或从学校到饭堂沿途走路的短暂时间来谈谈，彼此心里都明白这是为了填报告表的。我对于这项工作深感麻烦和机械，感到这是一种浪费，因而我每星期谈话的报告是比较少的，因此，他们之中，即领导层中有人批评我的活动不普遍。

谈到填写谈话报告表问题，使我回忆起一件有趣的故事：我从许多同志中听到一种流言，说蔡畅谈话的报告表中，同她的丈夫李富春的谈话过多，而同其它的同志谈话太少。这种流言和批评，假如是在一种正常的生活环境之中，是不会有的。他们在法国时便是夫妇关系，据说当他们从法国到莫斯科后，便向旅莫支部的负责者要求一间小房子两人住在一起，这本是一种合乎人情的要求。但由于当时的环境特殊，将近百人的中国同志，年龄多半在二十五岁左右，有的还年长一点，年轻的很少，全都是过的独身生活，是一种变相的僧侣生活，男的都分别几个房间住在一起；女的当时只有和另一个女团员住一间房子。因此，李富春和蔡畅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他们虽是夫妇，但都是学生，不能享受特权。这样蔡畅和她一同来的女同志郭隆真住在我们的房间里，李富春则和其它的同志住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俩只有寻找课余时间相互接触，私人谈谈，当然就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和其它同志普遍的谈话、这本是一种合乎常情的事，但由于当时他们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环境之中，大家差不多都有一种微妙的歇斯底里的变态心理（佛洛以特或其它性心理学专家可以分析这种变态心理），因而他们遭受到近乎笑话的流言和批评。

在1925年3月8日，全苏联举行隆重的纪念会，节目都是演说和游艺。全东大各民族的学生，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那一天下午，都齐集于莫斯科一所大会议厅里，举行庄严的纪念会。主席团就座后，主席致开会词，接着就是一位德国的老革命蔡特根（CLARA ZETKIN）莅临讲台了。她是德国老社会民主党左派，她同李卜克拉西、卢森堡、墨林（马克思传作者）同组织斯巴达卡斯，为德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看来她当时的年龄在七十以上，从他演说时那种热情洋溢和激动的声浪，就可以看出她急进的女革命家的性格。由于她的年龄和演说时过于热情和激动，因而当演说完毕时，她几乎昏倒，仿佛连气都透不过来。她对这个纪念日之所以特别激动，是由于在1910年世界各国前进的妇女于3月8日在丹麦的京城哥本哈根集会，由蔡特根提议定是日为国际妇女节。因而，往后“三八”便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前进妇女所纪念的国际妇女节了。

当蔡特根演说完毕后，就是表演各种游艺的节目，有歌舞、戏剧、魔术和其它技艺等，一直继续了数小时才欢尽而散。

晚餐后，我被二处的晚会主持者邀请演讲（当然是预先同中国旅莫支部负责者约定

的），一处是在莫斯科的露天大会，主席是一位年轻而健壮的俄国女同志，到会的全都是妇女。当主席团的人员就座后，主席就宣布开会，并介绍我作演说，由袁庆云翻译。当我的演说完毕后，即被他们举起来，然后热烈地拥抱我，稍停片刻，袁庆云马上带我到第二个演说的地方，那是莫斯科的一座大戏院，规模宏伟，建筑亦颇富丽堂皇，到会的差不多也是妇女，但由于规模甚大，也有许多男子，即到会妇女的丈夫参加其中。当我在讲台上演说时，我的视线曾不断地投射听众的面上，窥视到她们对于中国女同志的演说，表现极有兴趣的神情。这次的翻译是由一位中文很好的俄国同志格利哥尔担任的（他在哈尔滨多年，因而中文很好）。我的演辞并不限于发挥“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是着重于把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同俄国的十月革命联在一起。我强调说：“处在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妇女，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把中国的革命推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把妇女带到像俄国的妇女同样的解放状态；而且苏联妇女的解放，不过是世界妇女解放的一个环节，不过是世界妇女解放的一个范例。我希望苏联的女同志特别注意和帮助世界妇女的解放运动，尤其是落后国家，像中国一样的国家的妇女运动，以期在未来的“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全世界的妇女都能够像今天苏联的妇女纪念这个纪念日的情形一样”。（当然，我的演说辞比我现时所能记忆的比较长而复杂得多，但我现时没有可能记忆完全，而只能记忆其要点。此演说全文已发表在莫斯科一个妇女杂志上，我当时曾有一份，但后来回国时不能携带，甚至连杂志的名字也忘记了。）

当我演说完毕，就进行各种游艺节目。格利哥尔请我和袁庆云一同在戏院楼厅的咖啡室喝咖啡，闲谈片刻，我们便一齐坐在舒适的红丝绒座位上，欣赏晚会的游艺节目。我们一直留到深夜晚会兴尽而散，我满怀着愉快的心情，踏着轻快的步伐同袁庆云一道边走边谈地回宿舍。

1925年3月，由于国内革命运动的生长，需要工作人员，中共中央打电报叫罗亦农立即回国，王若飞亦愿同往，旅莫支部执委决定他们二人一同回国，于3月9日他们就离开莫斯科了，罗亦农回国后，继任旅莫支部的书记为王一飞，他是浙江人，具有浙江人的温和性格，老好人，对同志的态度很友善，人缘甚好，但缺乏像罗亦农那样的魄力，尤其身材矮小，更显得他平凡无力。执委中原有袁庆云、刘伯坚、陈乔年照旧，但补进李富春。青年团的负责人李求实参加，但并非正式执行委员。

李富春，湖南长沙人，具有长沙商业城市人的圆滑，看风转舵，短小精干，颇有外交手腕，他从不出面批评别人，只是在幕后支持执委中多数的一方。

李求实，湖北人（武汉），面目清秀，女人气质相当浓厚，说话总是低着头，低声细气，活像一个思想尚未解放的女人，缺乏男子的风度和气魄，小家气，说话有些刻薄，但他有某些聪明。由于他是武汉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当我和其它四个同学加入青年团时（一九二二年四月），刘昌群、李书渠和他均为武汉青年团负责人之一，因而他被选为旅莫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参加执行委员会。自他参加执委后，对同志们的监视和批评更为苛刻。假如他发现某同志的思想有问题时，他就在执委会中提出来，执委中的几个人，首先陈乔年积极支持，因他当时的思想在某些问题上，尚未成熟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而容易接受李求实对同志的某些过分苛刻的批评，尤其是对从

中国派去的大学生，对工人同志或从法国派去的知识份子比较宽容（因从法国去的知识分子都曾做过工。可称为工人）。

陈乔年为陈独秀之次子，陈延年之弟，他们于1922年末从法国勤工俭学转入东大。他本是一个体格标准（略嫌单薄），脸庞白净，两颊经常泛着红云，大家都叫他鸦普洛果（俄文即苹果）。他学习很认真，本质亦好，但嘴有点刻薄，尤其开玩笑时总是很粗鲁。同他的形象颇相称。这也许是由于当时不正常的生活所招致的精神变态。刘伯坚在理论和组织观念方面都有相当的修养，旧文学也有根底，口才甚好，这差不多是四川人的特长。但由于他仍旧保存着相当浓厚的土生活方式和旧道德观点。虽然他在法国多年，但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多半处于法国里昂一隅，即住在巴黎的，他们所接触的仍旧是中国人，生活也是偏向的，因而他们除了从书本、报章杂志上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外，而没有同法国人的生活联系；更由于贫穷，没有享受过先进国家现代化的物质生活，